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the ancient ruins of Mohenjo-daro in Pakistan. The image shows a high, weathered stone wall with a crenelated top edge, typical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The foreground is a rocky, uneven ground with some smaller structures and debris. The sky is clear and blue.

喇嘛王国的覆灭

〔美国〕

梅·戈尔斯坦——著

杜永彬——译

喇嘛王国的覆灭

〔美〕梅·戈尔斯坦 著
杜永彬 译

时事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3 号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MELVYN C. GOLDSTEIN

with the help of Gelek Rimpoc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London, England

© 1989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First Paperback Printing 1991

喇嘛王国的覆灭

[美] 梅·戈尔斯坦 著

杜永彬 译

*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9.25 字数: 721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80009-219-4/I·19 定价: 38.50 元

汉译本序言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 (M. Goldstein) 于 1991 年出版的《西藏现代史 (1913-1951) ——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Melvyn C. Goldste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89-1991)。

全书共二十一章，照片插页 61 帧，地图 11 幅。可谓皇皇巨著，洋洋大观矣！此书一出，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纽约书评》、《宗教研究评论》、《中国季刊》等美国评论性刊物都分别刊登了对该书的评论，而迈克·胡特 (Michael Hutt) 的简短有力的评语，可谓极而言之，他说：“如果你一生中仅仅愿意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么，你就读读戈尔斯坦的这本书吧！”

本书划定的年限是 1913-1951 年，这正是风云变幻、海立山奔的年代。这期间，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1914-1918 年和 1937-1945 年)，进步的、民主的、人民的力量和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力量进行了世界规模的大厮杀、大搏斗。战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许多专著详为论述，此处不赘。

单就咱们中国而言，在此期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维持两千多年的帝制系统的封建王朝，随后又进行了长时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规模之大，时间之久，都是空前的。最终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国人民经历了如此惨痛的历史，全身布满伤痕，难忘苦难的岁

月和痛楚的悲歌，痛定思痛，其中最大的创伤莫过于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蚕食我国的狂潮，肆无忌惮、狼噬虎吞，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猖獗的各种活动：自白山黑水、蒙古大漠、新疆绿洲、西藏高原、西南边陲，直至台湾宝岛，或则强行割占，或者制造事端，煽动分裂。那时，好端端的中国，无缘无故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盘中餐、俎上肉。所谓“西藏问题”就是那一时期炮制出来的“杰作”，人所共知，毋庸多谈。^①本书作者选择了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爵士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合影作为封面，此时无声胜有声，恰恰如实地托出了这一时期在西藏问题上肇因和发展的一出微妙戏剧的幕前幕后的导演，决非偶然。然而，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大陆行使自己的主权，作为真正独立的国家，挣脱了列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枷锁铁链，中国大地上再没有外国的租界，没有飘扬着外国国旗的军营，没有在中国街头横冲直撞的外国吉普车，没有停泊在中国内河和海港口岸的外国军舰……这就是中国人常引以为自豪的一句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对于某些外国洋人来说是十分不愉快而且无可奈何的事。以中国神圣领土西藏而言，再也不是由寇松勋爵（Sir G. N. Curzon）、荣赫鹏（Young Husband）上校、查尔斯·贝尔爵士和黎吉生（H. Richardson）先生等人密谋策划、指点江山、颐指气使说了算的时代了。这也就是使帕特逊（G. N. Patterson）、范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赫·哈拉（H. Harrer）之流怒不可遏地编造神话的根本原

^① 请参看杨公素：《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及剖析》，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因^①。似乎也就是我们跟西方某些人士老是说不到一块去的症结所在。^②好了，现在梅·戈尔斯坦教授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出版了，读者可以放心了吧！作者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不会有中国血统的半点嫌疑，当然，他有美国人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他会以美国人的眼光来观察、分析、判断中国（包括西藏在内）的事。我们决不要拉外国人在价值取向上跟我们一致。看来，戈尔斯坦有志于此久矣。1968年，当他还在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时，就以《西藏政治体制的人类学研究》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全书共255页，打印本）。那时，他就对西藏政治制度的腐朽性有所了解。后来越发不可收拾，1982年又发表了《拉萨的街头歌谣：西藏传统政治社会的讽刺文学》^③，其尖酸泼辣、嘻笑诙谐，揭露西藏社会的黑暗丑恶，曾引发一批把西藏农奴制奉为神圣不可侵犯、并把西藏农奴社会说得如何如何美妙、如何如何幸福乐土的卫道士们勃然大怒，向戈尔斯坦头上倾盆大雨似地泼出污水浊泥。戈尔斯坦作为科学家，

① 乔治·帕特逊 (G.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1960.

A Fool at Forty, 1970.

范普拉赫 (Michael C. van Walt van B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1989.

赫·哈拉 (H. Harrer) 曾以 *Seven Years in Tibet* (《旅藏七年》) 一书博得浮名后，即以藏学家身份在西方招摇。

这三位作者的大作都可以说是发挥了高度想像力的作品，借用西藏问题来反华是这三位作者的共同理想。尤其是帕特逊和哈拉先生还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和解放后从事与学者身分极不相宜的活动，本书第二十一章有所记载，可供参考。另外，谭·戈伦夫在《关心亚洲学者集刊》1977年第9卷第1期上刊有一篇题为《世界屋脊》的评论，对帕特逊先生作了批评，可以参考。

② 请参阅杨公素：《评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载《中国藏学》1990年第2期；柳升祺：《评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史观及其他》，载《中国西藏》1991年春季号；张植荣：《对历史与国际法的严重歪曲——评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载《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

③ 此文饶有趣味，中国的藏学界颇为关注，谢继胜将其译为汉文发表于《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对自己的观点毫不隐瞒，也不忌讳。他在本书中结论性地指出：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种和谐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共识，从而给二十世纪的西藏历史带来了灾难。”

“寺院集团拥护庄园农奴制的经济制度，并因而成为极端保守的势力。由于西藏力图适应二十世纪日新月异的形势，所以，宗教和寺院就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

这些话，毕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戈尔斯坦教授据长期追踪调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所得出的结论，得来并不容易。他，作为社会科学家，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曾经花了很大力气进行田野工作，^①并且长期深入地学习藏语和藏文。为此，他还出版了《藏英字典——现代藏语》（1978年加德满都出版）和《英藏字典——现代藏语》（198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洛杉矶分校出版社出版）。以如此深厚的语言功底去发掘深层的史料，锲而不舍，孜孜兀兀，令人敬佩。我国近代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曾说过：

“一时的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②

可以说，戈尔斯坦的大作是实践了这一准则的。他的书，绝对不是那种鹦鹉学舌、东拼西凑、抄袭他人，据为己有，盗名窃誉、欺蒙学界的骗子所能望其项背的。我们来看看他所发掘的材料吧。

^① 据作者自述，为了记录口碑资料，花了三年多时间，在西藏走访了79位原西藏僧俗官员和事件见证人。

^② 陈寅恪（1890—1969）：《金明馆丛稿初编》所录《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最富于刺激性的莫过于英国和美国以及英国治下的印度政府的外交、政治档案了。这是戈尔斯坦教授的书中最为得意的部分，也是他花大力气得以公布这些档案，把上述政府对西藏问题的隐私公之于众，用以表明自己的写作态度是不偏不倚而中立、公正的。这些档案仅仅是全部资料中冰山的一角而已，就是这么一点点也确有其价值：

L·韩德逊，是当时美国驻印度大使，代表美国国务院在印度呼风唤雨，八面串连，制造了一系列大事件，颇具戏剧性。今举出韩氏致达赖喇嘛的密信一封。1951年3月，在达赖喇嘛正打算从亚东返回拉萨、西藏即将和平解放之际，韩德逊眼看着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接管西藏而万分惊慌，秘密致函达赖喇嘛：

“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最近访问了亚洲，他对西藏表示同情，并对至尊达赖喇嘛及其臣民的幸福深表关切，兹发去信函，内容如下：

一、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决定获得对西藏的全面控制，达赖喇嘛对中共政府作出任何让步都不能改变这一决定。中国共产党宁愿采用计谋而不使用武力来控制西藏。因此，他们亟欲劝说达赖喇嘛达成一项将允许他们向拉萨派驻一名代表的协议。

二、北京的共产党当局向拉萨派驻代表，只会有利于中共加紧进行对西藏的全面控制。

三、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之前，中共将难以接管西藏，无论如何，达赖喇嘛不应当返回拉萨或者把自己和西藏的财物运回拉萨。（美国国务院删去了一部分）运回拉萨的任何财物最终都可能被中共接管。

四、在存在着中共可能会以武力或计谋夺取拉萨的危险之际，达赖喇嘛不应当返回拉萨。如果中共企图阻止达赖喇嘛出逃，他就应当离开亚东前往别的国家。

五、建议达赖喇嘛马上派代表去锡兰，设法同锡兰政府一道

为达赖喇嘛的财产直接转运到锡兰作好安排。这些代表还应当设法获准为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在锡兰寻找避居地，为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找到落脚点。在锡兰政府准许前来避难之后，达赖喇嘛应当请求印度政府作出担保，一旦他及其家人离开西藏，将为他们途经印度前往锡兰提供方便。

六、假如达赖喇嘛及其家族不能在锡兰找到安全的避难所，那么，他一定能够在其他任何一个友好国家，如西半球的美国等找到庇护所。

七、达赖喇嘛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美国可能也有益处，在那里，该使团将作好直接向联合国呼吁求援的准备。不用说，达赖喇嘛已经知道由西藏派驻联合国使团的成员所提交的请求美国准予签证的申请，将会得到善意的考虑。

发自新德里（未署姓名及日期）”

善良的人们，请读一读这封信吧，虽然历史的长河汹涌澎湃，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但是至今仍不失其新鲜的新闻价值。人们难道不可以从中悟出美国山姆大叔为什么至今口口声声在叫嚷什么“西藏人权”的咒语么？后来，直到1959年3月拉萨的事件发生，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在印度土地上搞了个流亡政府，坚持反华、分裂祖国，难道不正是L·韩德逊大使秉承美国政府的意图早已安排好了的么？

戈尔斯坦教授一书确实可以打开一些天真的、相信美国民主的人们的眼界。

至于印度政府、英国政府的外交档案也值得人们仔细阅读的。

戈尔斯坦教授引用的资料中第二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相当重视口碑材料，尤其是能征引拉萨街头的政治讽刺歌谣入史，可谓别开生面，画龙点睛。当时的拉萨，没有报刊杂志，没有广播电台，没有新闻通讯社，没有任何可供人民群众发表言论和见解的手段，唯一可用的就是这一武器——口头歌谣。戈尔斯坦教授独

具慧眼，广泛搜集，并作出恰当的诠释，使它能很好地反映人民大众对某一事件，出其不意地对某些人物的嘲讽和讥刺，十分传神，虽不成典故，确可算今典，请看下面两例：

Ka shod da ru mgo la/ 噶雪巴似两面鼓，
lha lcam gtor mavi dkar rgyan/ 〔有一个〕扁平脸的妻子，
mi byed dgu byed byas pa/ 行为轻率而鲁莽，
mi srid srid pa byung song. 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的事。

yod pas rgyu yis brgyab gis/ 有钱人建房靠财力，
med pas dbang gis brgyab gis/ 无钱者造屋靠权力，
ka shod bu lon pho brang/ 〔而〕噶雪巴所建的一座特殊“宫殿”，
ma vdra cig rgyag gis. 却靠的是他负债的能力。

me mdav dbyin ji kha thung/ 英制来福枪，
chab mdo gzhung la bskyal nas/ 被运送到了昌都战场。
tsha zhag vgrigs pavi lam rgyags/ 〔藏军的〕食宿行都得到悉心照料，
slong gin slong gin log byung. 〔而他们却〕一路乞讨返回了西藏。

戈尔斯坦教授是美国人，受的是西方的传统教育，他对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心理都是以西方的观念来理解的，因此，其对西藏政治、文化的评议，必然有可商之处，其显著的地方如：

对于热振活佛及其当政时期的政治措施的评价。作者本有机会接触过当时政界要人的回忆录及有关史料，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的，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完全沿袭了英国那位黎吉生先生的观点，是非被颠倒了。在1976年第二届国际藏学会上，黎吉生先生撰文不过想掩盖他本人出谋划策、通过

其代理人谋害了热振活佛的事实，从而歪曲了历史的真象^①。非常遗憾，戈尔斯坦教授看不到事情的真象，而在一些非本质的问题上（如持戒不谨严等）兜圈子。

讨论西藏民族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不可能脱离整个中国的大环境，不可能游离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背景。戈尔斯坦教授恰恰在这方面有意回避，或者是不愿引起争论而有所疏失。（据我所知，戈氏不谙汉语文，不无遗憾，因而送其公子多布杰到中国人民大学专攻汉语文，想弥补这一缺陷。）本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自己的传统和继承下来的精神财富，从而构成本国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基础。精神价值、智慧、思维方式和道德基础，千百年来仍然活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心中。民族之间存在着差异，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丰富多采的一面；但是还有其统一的民族共性，这是长期以来维系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的另一面。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华民众各族儿女血肉相连，生死与共，不正说明这一问题么？一小撮由帝国主义豢养、精心培育出来的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不过是中国历史长河中飘浮的泡沫而已。作家要联系传统与现实，看清整体与局部，分别主流与漩涡，最后弄清现象与本质的区别，也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戈尔斯坦教授作为人类学家，他十分注意民族间的差异性，但却不太注意民族的同一性，他未能把西藏历史放到苦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中去考察。因此，其某些解释和论断就难以令人信服。

在戈尔斯坦的书中有许多令人很感兴趣的篇章，有不少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断。但是，也不无令人惋惜的是他缺乏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通盘了解。否则，他就不会仓促地写出那几句跋语，而会是另一种写法了。笔者愿意推荐读者们读一读

^① 黎吉生 (H. E. Richardson): The rva-sgreng Conspiracy of 1947(《1947年热振的阴谋》), 载《藏学研究——第二届国际藏学研究会论文集》第16—20页, 牛津1979年出版。

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谭·戈伦夫 (A. Tom Grunfeld) 的一本书《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年汉译本), 似乎可以看作本书的续篇。

本书汉译者杜永彬同志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以藏学研究获硕士学位。研讨藏学孜孜不倦, 好学敏求, 颇见功夫。他决定翻译梅·戈尔斯坦教授的大作, 跟我商量过, 而且下了不少功夫, 历时一年有半, 手不停披, 笔不停书, 查阅大量资料, 反复核对藏文原文, 并参考若干汉文记载, 以求准确。我曾有机会与他共同研讨某些章节和问题, 深深感到我国青年学者的努力探索精神, 钦佩他能坚持不懈, 奋力完成这七十万字的译事。

今, 全书已经译竣, 十分令人欣喜, 乐为之序如上, 以此就教于海内外同道及原书作者梅·戈尔斯坦先生。

王 尧

1993年5月30日写竣

于北京寓庐

编者的话

M. C. 戈尔斯坦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与藏学家。在西方藏学界，他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为国际藏学的发展作了巨大贡献。1986年以来，戈尔斯坦教授先后多次旅藏，深入牧区，实地考察，有一次到牧区生活研究，长达16个月，其辛苦及求实精神令人敬佩。在此基础上，戈尔斯坦教授先后发表一系列文著：《西藏西部的牧民》，《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喇嘛王国的覆灭》。

这些研究成果推进了西方藏学的发展。特别是《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集西方藏学研究之大成，成为其藏学研究的代表作，也是西方研究西藏现代史的权威著作。

本书资料翔实，引证丰富。不仅使用大量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回忆录及原始档案，而且使用英印政府、英国及美国政府的大量外交政治档案。后者的征引是目前西方有关西藏现代史研究著作中最为全面、完整与丰富的。另外，作者还相当重视口碑资料，大量征引拉萨街头的政治民谣入史，别开生面，文笔生动。本书的史料价值，正是我们组织翻译该书的初衷及目的。我国藏学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是全球藏学研究的中心。我国学者对藏汉文字的藏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均走在世界的前头。但是西藏现代史研究涉及到大量外文资料。英印殖民政府，帝俄、日本军国政府以及美国政府都曾觊觎西藏。因此在这些国家官方外交政治档案中留存大量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原始档案。这些外文资料对于我国藏学研究无疑是一个良好的补充。囿于诸种客观原因，迄今中国藏学界尚未开展此项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实乃一项

缺憾。在该书的行文中，作者花了大量篇幅征引史料，尽量多引，保持原貌，并注明出处，一丝不苟。译者杜永彬同志，治史出身，获藏学硕士，汉、藏、英三种文字皆通，翻译过程中并得我国藏学专家王尧教授指点，翻译力求准确无误，以保持史料原貌。

我们希望该书的出版，不违初衷，能够为我国藏学研究提供更多、更权威的外文资料及其他史料，供我国学者研究西藏现代史参考。

正像其他西方学者一样，戈尔斯坦教授在前言中标榜自己持论中立客观，“既不倾向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亦不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一边”。但是，由于作者受西方文化教育，其历史观、文化及心理观必然有与东方人的不同之处。他对西藏现代史的描述与评论肯定有与中国人的看法相左之处，甚至与历史原貌有不符之处。我们出版该书的目的并不表明我们与作者的观点相同。书中存在的诸多观点、立场的异见，深望读者明察。

编者

1994年6月

汉文版前言

见到我所撰写的《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汉文版的出版是莫大的殊荣。向所有对亚洲史感兴趣的人们奉献一部详尽而论述公允的西藏现代史专著是我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得知中国的汉藏同仁现在将为我的研究提供方便，感到非常欣慰。在撰写本书时我力图尽可能准确地引用有关文献和对我有用的材料，可是，倘若读者发现了新版本的错讹之处或提出修正建议，本人将欣然接受。

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西藏研究中心主任 梅·戈尔斯坦
1993年8月27日于拉萨

前 言

1912—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结束了在印度的流亡生活返回西藏（见图片1），他手下的自卫武装将汉族官员和驻军通通驱逐出西藏，重新确立了他的统治地位，并开始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期39年对西藏内外事务的统治。中国从未接受过这种状态，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有效地恢复了其对西藏的控制。但是，当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后，这种控制便失去了作用，西藏地方政府依然各行其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民政府一样，都把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视为其西藏政策的既定目标。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1951年5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所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辖的一个自治区。

关于西藏的政治地位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学术界和民间都盛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亲藏派认为，西藏是被中国共产党征服并被错误地纳入中国版图的独立国家；亲汉派则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分裂活动是由于清朝灭亡之后英帝国主义操纵策划的结果，可是西藏于1951年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两种派别集团常常因各自的政治利益的不同和孤立地看待事物而引起争论。

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既不亲藏也不亲汉，即既不倾向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亦不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一边，而是试图阐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到1951年，独立的藏传佛教王国事实上已经衰亡。本书所要考察研究的问题是，藏传佛教王国衰亡的过程及其原因，虽然外来势力的介入加速了藏传佛教王国的衰亡，内部力量为外来势力在西藏得势创造了条件，但是，西

藏的统治者仍竭力在内外事务并重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把握平衡。

第一部分（上编）阐述的主题和重点是 1933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的西藏政局，同时还考察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当时，西藏已摆脱了满清王朝的统治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第二部分（下编）论述的是 1941—1950 年大札摄政时期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藏传佛教王国进入了垂暮之年。

我对现代西藏藏汉民族饱受艰辛抱以极大的同情，实际上，这本书正是为他们而写的。我企望在西藏现代史研究领域发表一种崭新的观点，并因此而使人们得以正确地评价历史，而不再是出于现在的政治利益去评判过去。

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西藏历史的鲜明政治特点使笔者有必要说明撰写本书所依据的材料。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 4 个方面：（1）口头访问以及与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其他与历史事件有着特殊关系的人的谈论；（2）原西藏、印度和中国中央政府官员的原始记录（包括藏文、汉文和英文）；（3）英印政府、英国及美国大量的外交和政治档案；（4）报刊、书籍和论文，其中包括原始的政治资料。

口 碑 史 料

口碑史料是通过访问有关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的见证人而收集的原始资料，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珍贵材料，在官方档案和文献不易被利用的研究领域尤其如此。然而，利用口碑史料来研究历史也有局限，因为记忆往往是具有选择性的，事件参与者的记录有时带有自我倾向，并且，当前的政治形势也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记录的数字和准确性。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当事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口碑史料进行仔细的评判和鉴别，并同所能利用